

民族史译文集

14

一九八六年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11319/18

民族史译文集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历史研究室
一九八六年

目 录

- 南诏与吐蕃的联盟……………〔美〕查尔斯·巴克斯著(1)
赵衍荪译
- 南诏国王考……………〔日〕藤泽义美著(25)
李岩峰译 刘世哲校
- 中国回民的叛乱与大理国……………〔法〕鲁意·卡乃著(38)
马汉宗译
- 高山族民族史……………〔日〕马渊东一著(58)
钟美珠译 王恩庆校
- 华南土著居民的种族——民族分类及其历史背景
……………〔日〕白鸟芳郎著(65)
钟美珠译 刘世哲校
- 论汉代夔人的族属及文化系属……………〔日〕竹村卓二著(80)
吴相顺 田晓岫译 黄有福校
- 二十世纪初的贵州苗族……………〔英〕塞缪尔·拉·克拉克著
王慧琴译(89)
- 帕木竹巴王朝的衰颓过程……………〔日〕佐藤长著(113)
邓锐龄译
- 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苏〕A·C 马丁诺夫著(120)
张开运译
- 第15期目录预告……………(112)

南诏与吐蕃的联盟

〔美〕查尔斯·巴克斯 著
赵衍荪 译

〔编者按〕本篇译自1982年剑桥大学出版的《南诏王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一书第四章。作者查尔斯·巴克斯现任美国耶鲁大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专门从事中国西南民族历史的研究，1982年曾访问过我国。

公元748年，统一南诏的皮罗阁卒。同年，唐朝遣使册封其子阁罗凤袭“云南王”。阁罗凤子凤迦异后又继嗣王位¹。

阁罗凤袭王爵之前，即对南诏的统一和巩固作出了贡献。作为国君，他即位后面临着种种更为严峻的挑战，皆与南诏国兴亡利害攸关。我们所见的史料，对他一致赞扬，说他迫于形势，在处理国事时采取了既灵活又坚决的立场，堪称南诏史上最英明的君王²。

战事的爆发

回顾八世纪四十年代的历史，在汉人企图从云南东部打通步头的通道，并控制安宁城，以开发盐矿之际，曾激起了爨部的反抗。因此，汉人只好求助于南诏，嗣后，斗争的结果是南诏拥有爨部的地盘，土地人口大大增加。当时，表面上南诏和唐朝虽保持着友好关系，但是，由于这条通道对唐朝，特别是对四川地方的关系至为重要，它是一条通往中国保护国安南及其富饶商埠交州（今河内）的捷径，在南诏征服了爨部，切实兼并了它的属地后，控制这条通道就成为南诏和汉人利害冲突的根源³。据说，唐将何履光（广西人）曾率士卒从安南经步头通道攻打安宁⁴。在此之前，南诏的前统治者皮罗阁与赴南诏的唐使发生过争吵⁵。此事虽不详于史籍，但已能见南诏与唐朝的日益不谐，而且到了八世纪五十年代初竟成为爆发公开战争的历史背景。

根据汉文史料，战争的导火线是由于姚州即天宝年间（742—756）被称为“云南”的唐太守张虔陀的淫乱贪墨行为引起的⁶。虽然有关此人的资料不多，但据推测，他可能是当地酋领，被委派担任这一官职，而不是唐朝派去的汉官⁷。这一推想与八世纪二十年代后唐朝在姚州显然日见失势的史实相符。不管怎样，张虔陀对阁罗凤诛求无厌，在阁罗凤循礼带领随从到四川参见唐朝的地方都督时，张虔陀甚至侮辱了阁罗凤的妻妾，这是人所共知的史实⁸。

值得注意的是，现存最重要的南诏遗物，公元766年，阁罗凤所建立的《德化碑》

虽没有提到这件凌辱妇女的丑事，但碑文中却一件一件地对张虔陀竭力削弱南诏、煽动吐蕃、爨部和他敌对势力攻击南诏的事进行了控诉^[9]。阁罗凤愤懑异常，多次上书朝廷，但由于张虔陀贿赂宦官，在朝廷查处时受到包庇，因而阁罗凤冤屈难伸，继续受到屈辱和不平等的待遇。这样，在一切申诉都失败之后，阁罗凤就因积怨难平而攻占了姚州，并把周围一带的居民置于其权力统治之下。攻下姚州后，阁罗凤为了泄忿，处死了张虔陀（一说张服毒自杀）^[10]。

双方的冲突理应从此结束。然而虽有这一相对说来微不足道的事件，四川的中国官员却愚蠢已极，仍使他们和南诏之间的矛盾激化，一连串后果越来越严重的冲突终于升级为大规模的战斗。《德化碑》说阁罗凤不愿扩大事态，他只恨张虔陀，不堪于他的无理挑衅，但总的来说对唐朝则并无怨恨。然而，尽管表忠剖白，唐朝却不加理会^[11]。

《德化碑》确实是表白书，它是特意针对当时南诏的种种行动而写的。虽然，碑文中表达自己完全无辜，只提出正当的申诉和善良的心愿，我们对这些不无怀疑。但汉文史料也说，后来造成全面战争的局势，主要应受其咎的是唐朝四川（剑南）节度使，而不是南诏^[12]。

公元751年夏，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发动惩罚南诏的战争。但唐朝的讨伐军出师不利，在长江上游的泸南渡江时损失惨重^[13]。即使如此，阁罗凤仍反躬自责，对张虔陀事件深表遗憾。他释放了唐军俘虏，修复受战争破坏的姚州。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还提出警告说：“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14]。但对唐朝而言，不幸的是这种坦率的警告没有使鲜于仲通改弦易辙，反而在盛怒之下，囚禁南诏的来使，仍然以战争相威胁^[15]。

最出人意外的是，在战争中鲜于命令部队西越点苍山天险，采取侧翼突击包抄大理坝子的战略^[16]。单就地形险峻的特点而言，采取这样的战争行动是几乎没有成功希望的。但也不应忘记，仅仅几年之前，在一次和吐蕃作战的时候，在高仙芝的率领下，一支唐朝的大部队曾越过地形也非常险峻的帕米尔高原^[17]。看来从西面进攻并占领大理坝子也并非如前人所说那样完全不可能^[18]。

尽管阁罗凤仍声称忠于唐朝，南诏却也不能不另有打算。因此，他先前的警告应验了，南诏王确实毫不犹豫地投靠了吐蕃。应当记住，藏文的史书确证，说在整个八世纪上半期，南诏就曾与吐蕃有过直接的接触。公元751年派了高级使团到吐蕃的首都进贡就是一个先例^[19]。吐蕃当时也以厚礼回报，把南诏当成“兄弟之国”。为了表现两国的兄弟关系，吐蕃封阁罗凤为“赞普钟”（“钟”意为“弟”，“赞普”意为“吐蕃王”，“赞普钟”意为“吐蕃王之弟”）^[20]。此外，赐阁罗凤以“东帝”的封号，并赐阁罗凤和他的廷臣一枚金印和“告身”，以承认他们的权力。公元752年阴历正月初一，南诏采用了吐蕃的封号，山盟海誓，说要忠于吐蕃^[21]。

这时，朝廷竭力掩盖鲜于仲通的败绩。鲜于的宫廷庇护人杨国忠竟宣称征讨云南之战已获胜^[22]。和鲜于一样，杨国忠也是一个出身于和隋朝王室有连系的中等贵族家庭的四川人。杨国忠通过和唐玄宗的宠妃杨贵妃的近亲关系，在宫廷中高踞官位，煊赫一时。八世纪四十年代，杨国忠在长安已攫取到朝廷的财政权，同时又在争夺当时已年老多病的“实质上的独裁者”李林甫之位中施展伎俩，想取而代之^[23]。他在宫中抓权的手法之一，就是亲自控制四川军队。那时只有川军的指挥权未落到唐朝雇用的外族将领

手中，而由汉人节度使掌握⁽²⁴⁾。因此，杨国忠安排鲜于仲通担任剑南节度使，作为他的亲信⁽²⁵⁾。

杨国忠要想在日后与臭名昭著的河北节度使安禄山及其同盟的军队较量，最重要的是对川军保有绝对的控制权，并能显示这支军队的力量。所以鲜于仲通热衷于和南诏打仗，目的就是为了扩大四川的地盘，提高川军的威望⁽²⁶⁾。因此，杨国忠就必然千方百计掩盖惨败真象。然而，历史上如此严重的挫败竟隐瞒了这么久，这一点即使皇帝再昏庸、再受蒙蔽也是不好解释的。

不久，杨国忠受命任剑南（四川）节度使。然而，当李林甫正式任命他回川就职时，他却向杨贵妃哭诉，要求皇上取消任命。李林甫死，杨国忠得恩宠遴选，由御史升任宰相⁽²⁷⁾。

杨国忠毕竟没有放弃过惩罚南诏的企图。他一直准备发动另外一场大规模的战事。为了补充四川唐军和早先远征南诏时士卒伤亡的损失，把增援部队（其中显然有一支是由过去远从东北边疆的嵩州俘虏来的士兵组成的部队）调到了边防线上防御南诏⁽²⁸⁾。尤为重要的是，杨国忠还采用了大规模募兵的手段来加强力量⁽²⁹⁾。

八世纪中叶，唐朝的军队，尤其是边将中由汉人统率的军队已经非常腐败⁽³⁰⁾。征集民兵轮流戍边的旧“府兵”制已解体。伤亡无法补充，马匹武器给养奇缺。贪污腐化的官长乘机吃空额，私吞征发来的军需品发横财。从公元743年起，据我们所知，征兵步骤已遭到彻底破坏，整个军事制度也腐败不堪。搜罗到军队里当兵的人多半是不能打仗的游民无赖之徒⁽³¹⁾。

此时，唐朝正规军也声名狼藉。朝廷直接指挥的军队也完全无力应战。能打仗的只能靠那些外族将领统率并驻扎在北部边区的部队⁽³²⁾。确实，南诏之竟敢与唐朝决战，是经过对积弱的唐朝军力的审慎估价后才决定的，并不是鲁莽从事之举。

杨国忠在八世纪五十年代初颁布的募兵法极为严厉。由于征发，民众妻离子散，痛苦异常。史书说，出身于有战功的勋家，曾受到免征的人，现在甚至还首先被征入伍。兵员缺额，就以欺骗手段，请穷人去赴宴，席间把他们突然捉住，穿上粗布军衣，戴上沉重镣铐，马上驱赶他们上阵。如半路逃亡，就以押送的官吏抵偿兵额，到前线打仗⁽³³⁾。

半世纪后，唐代大诗人、大政治家白居易写诗谴责征讨云南战争的愚蠢和杨国忠的募兵法的残酷：

新丰折臂翁

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
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
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
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³⁴⁾。
惯听梨园歌管声⁽³⁵⁾，不识旗枪与弓箭。
无何天宝⁽³⁶⁾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
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³⁷⁾。
闻道云南有泸水⁽³⁸⁾，椒花落时瘴烟起。
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
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

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
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
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
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
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
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
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
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
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孤魂骨不收。
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啾啾。
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
不赏边功防黩武^{〔39〕}；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
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
请问新丰折臂翁^{〔40〕}。

这首是白居易碰见长安府新丰县一个老翁后的写实诗呢？或是他写的著名的同类诗歌中的一首纯属虚构的政治讽刺诗呢？我们把这首诗提出来的意图，不在乎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因为战争的不得人心，人民的巨大苦难，许多旁证史料上都有充分的记载。不管什么时候执行这种远征云南的募兵法，那末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人民的恐惧、痛苦和普遍反对^{〔41〕}。

然而，杨国忠和追随他的将领仍加紧执行其战争计划。752年夏，杨国忠谎奏军情，竟说四川唐军大败援助南诏的六十万（！）吐蕃大军，收复了以前丧失的大片领土^{〔42〕}。但是，姑且不说这样大的数字是不可能的，就是这种说法，人们也是怀疑的。现代有些学者也不得不认为，杨国忠的这个奏章，如同他以前呈上的奏章一样，纯属假造^{〔43〕}。

根据《德化碑》的记载，公元753年，汉人又想恢复对姚州的控制。然而，南诏切断了汉人的粮道，包围了他们的城堡。真是“破如拉朽”，姚州又一下子陷落了^{〔44〕}。

第二年，公元754年夏，汉人又精心策划对付南诏的行动。当时，杨国忠的四川部将李宓率七万士卒进军云南，何履光（有时误为何復光）也同时领一支大军从南面协攻南诏^{〔45〕}。有些史料有何履光是在前一年夏从南面侵入南诏之说^{〔46〕}。又史载，阁罗凤巧妙地命令部下退却，以吸引李宓军深入南诏腹地。当他们抵达南诏首都（当时还在太和城）时，阁罗凤军凭城据守（城垣坚固足可抵御唐朝大军），不去交战。这种战略十分奏效，因唐军孤军深入，补给难以为继，饥馑瘴疠很快就使士卒的“什七八”逐渐死亡。当唐军不支撤退时，阁罗凤军就由城中杀出，结果李宓被俘，军队被彻底击溃^{〔47〕}。

南诏的史料记载稍异他书。《德化碑》说，唐朝联军是在邓川遭南诏和吐蕃夹击的。唐军被敌人全力合围后，“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河，积尸壅水”^{〔48〕}，溃不成军，将领纷纷落水淹死^{〔49〕}。

姑且不论何种史料较为准确，唐军大败，损失惨重则是事实。我们知道，杨国忠不仅向朝廷假报胜利，还继续增兵讨伐南诏。结果，近二十万精兵先后在云南战死^{〔50〕}。

死伤数字或有夸大，但唐朝在西南屡次失败，于国运确实影响极大。在多次战役中，朝廷手中所掌握的精兵损失惨重。由于地形险隘，气候恶劣，疟疾流行，补给困

难。绝大多数士卒战死^[51]。虽然全国民怨沸腾，都反对耗费国力的愚蠢战争，但谁都不敢请朝廷开罪杨国忠，在公元753年他继李林甫把持朝政后尤其如此。当军队征伐云南接连失败，朝廷对野心跋扈的边将无法约束之时，玄宗皇帝的嬖人高力士倒提出了警告，但皇帝听不进去，说他多管闲事^[52]。

所有这些只能带给唐朝致命的后果，正如高力士和其他许多人所料，唐朝就要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挑战。公元755年，无论对南诏发动的战争结果如何，安禄山叛乱之祸还是发生了。征讨南诏的战争使精锐损失，士气沮丧，社会动乱，这一切更使朝廷对安禄山之乱的这场挑战束手无策^[53]。

安禄山之乱确使南诏有可乘之机。当时朝廷为了平叛，急从边区调集还忠于它的军队，以致很快就失去了对许多边区的控制，其中如远至接近今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的地区，唐朝更是鞭长莫及。因此，对西南，唐朝的力量已经很有限了。幸而在整个困难时期，唐朝还能依靠牂牁郡（包括今四川东南、湖北西南、湖南西部和贵州北部地区）的首长赵国珍，他在当地至少名义上维持着稳定和对朝廷的忠诚^[54]。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与其比邻的四川在以后三十多年里形势一直不佳。

公元756年，南诏夺取了嵩州和会同，而且还占领了北靠大渡河的清溪关一带领土^[55]。《德化碑》说，南诏是按照盟国吐蕃王的指令，才对这一地区发动攻击的。嵩州抵抗，但抵抗者旋被消灭。会同则投降，其居民没有受害。公元757年，唐朝企图再控制嵩州，并加强台登北面的防卫。我们知道，又是由于吐蕃倡议协同作战，南诏又进攻并重占嵩州，而台登也被夷平，很多汉人被俘^[56]。

反唐战争迭获胜利，阁罗凤接着就把他的王国的注意力引向它的南疆。他御驾亲征，攻打今可能在云南西南部的寻传、裸形、祁鲜诸部^[57]。《德化碑》说诸部所在区域“畴壤沃饶”，可是人民并不开化。因此，公元762年，阁罗凤虽说征服他们，但实际上则是给他们以教化。诸部中后来凡“款降者”都得到抚慰安居，只有“抵捍者”才受到镇压^[58]。这也似乎表明，南诏对上缅甸的骠国的统治，就是在这个时期首次确立的^[59]。

此外，阁罗凤在东部地区也加强了南诏的统治。在安宁设管理盐矿开采，监督以前爨部领地的行政事务的驿站。公元763年，他又查勘这一地区，从战略地位和维持众多人口的生活两者考虑，选择了今昆明及其周围为建城基地。公元765年，他派儿子凤迦异到该地修建了柘东城。凤迦异随即驻守柘东，显然是在那里担负起为王国镇守从倔强而衰败的爨部手中取得的那片东部地区领土的使命^[60]。

然而，云南的任何加强统治的行动，都遭到了南诏盟国吐蕃的干预阻挠。这个时候，吐蕃势力在云南究竟扩展得多远，是很难了解的。当时吐蕃的前哨地点，大概已远达神川，此地紧靠横跨于长江上游的铁桥，即著名的铁索桥。然而，受吐蕃间接控制的地区必定更广，在整个八世纪，吐蕃统治和支持了云南西北角诸部。此时，吐蕃还庇护和支持原来统治六诏的王室的残余分子，他们是为了摆脱皮罗阁和阁罗凤父子统一六诏和全面征讨而逃到北方的^[61]。历史上找不到南诏和它的吐蕃同盟者商讨处置这些人和这片领土的材料。可以肯定，在与吐蕃结盟的整个时期，南诏对这一地区的任何部族都从来没有采取过入侵的行动。

阁罗凤时代的成就

虽历经战乱，但阁罗凤仍有许多不朽的成就。他从南北两边延伸了南诏的疆界，在东面加强了南诏的行政权力，同时还从内部巩固了政治组织，并使南诏的政体基本上定了型，这些方面都是我们要简略探讨的课题。

很多世纪以来，云南各部已有政治组织的雏形，南诏的政权机构，多少就是按照地方的这类政治组织形式建立起来的。地方的政治组织形式，看来又都是由于受了唐制的巨大影响而产生的。当时，几乎所有稳定的社会，都不断地和唐朝发生密切联系，不同程度地采用唐朝的制度。然而，到阁罗凤统治的朝代，南诏才显然尽力以唐朝的行政组织为典范，开始精心地向唐朝学习，以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

可惜的是，南诏如何行使政权，如何制定和推行政策，因缺乏资料，我们知道得很少。虽然，相对而言，南诏的官僚机构的基本轮廓还是清楚的。南诏王确实是个独裁者，他的绝对权力看来比中国皇帝还大。虽然，在其下有一个由六个清平官（在军事组织中清平官又与大军将等列）组成的议事庭以决国事^[62]。事实上，所有的行政权似乎都按军功委任。按理清平官仅设六人，然而人数时有变动，通常有七至八人^[63]。根据公文呈送和执行政策的需要，议事庭本身又设不同职能的许多官职。

八世纪中叶，从南诏官僚政治所精心设置的官位来看，在清平官组成的议事庭下面，又设分工明确的称为六曹的六个司主持公务。其性质如唐朝官制的六部，也是负责政府的行政事务的，和唐初各省按行政职能而分设各曹的情况相似^[64]。按南诏官制，六曹中管军事行政者为兵曹，管税收者为户曹，管外交者为客曹，管刑事者为刑曹或法曹，管人事者为士曹（有时史料上误写为工曹），管财政者为仓曹^[65]。南诏的军事组织也同样是高度的官僚政治化。理论上，最高级是十二大军将，但人数可变动。其中六人在王宫议事，六人委任在外治军，镇守重要城市。先是，有六个地方行政组织称“赆”。随后数目显然增加，而且可能由于效法唐朝新的地方统治制度，就把赆一级的官吏称为“节度使”^[66]。

除明显地模仿唐制外，南诏的行政设施也颇受吐蕃的影响，特别是南诏各级官员按繁缛的法规穿虎皮（大虫皮）礼服，遵循一套以“告身”的章饰表明官职的高低的制度，都是八世纪五十年代吐蕃王传给南诏的^[67]。虽然，也有些互相类似的地方，但在南诏的政治组织和官号方面，似乎没有吐蕃的直接影响，因为吐蕃在政治上也模仿唐制。

南诏军队有步兵和骑兵，还有精锐的近卫部队。显然，南诏社会的发展和其军事成就密切相关。勇武者奖，稍现怯懦者必遭重罚。一般地说，部队的武器和乘骑都由参军者自备，粮秣由国家供给，但数量很少，只够速战速决。虽有严厉的军纪约束部队，但一旦开进敌境，就准许士兵大肆抢掠以充军用^[68]。

从南诏实行的文武官员的考试制度，也还可以见到唐制的影响。南诏要求军人有骑射、攀缘、跳跃、泅泳、击剑的本领，并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为军人的本色，每年军队都按时操演，要接受检阅，清查装备^[69]。此外，文武百官要能计算，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在实行战争动员时，颁布的文书要一直发到农村一级，这说明南诏的老百姓普遍地

知书识字^[70]。所以后来南诏国内还产生了一些有高度文学修养的优秀人物^[71]。

评价阁罗凤的政绩时，有人肯会这样说：他的伟大成就只不过是在唐朝大军压境，进行报复性的入侵时，保住了南诏的政治经济的独立。虽然，南诏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当时就势必与吐蕃结盟，还要多少屈从于吐蕃之下；但是，在西南一隅，南诏毕竟在其领土之内还保持独立，仍然有自主的权利。阁罗凤向吐蕃求援，甚至要和吐蕃长期结盟，自然是由于要对付和唐朝大战的局面的缘故。不过，当时唐朝的军事效率衰弱，云南地形复杂，气候多变，所以南诏并不是不能靠单独作战来打退唐朝远征军的进攻。当时吐蕃给南诏的军事援助并不明显。

南诏有必要争取吐蕃的支持，它不能冒和唐朝、吐蕃两面作战的风险。然而，终因吐蕃对盟国诛求无厌，阁罗凤的继承者只有伺机中止这种不平等的同盟关系。当时，南诏从属吐蕃，向它纳贡和承担某些义务，但所付出的代价看来不是太大。

公元766年，南诏在首都太和城附近建立《德化碑》，热情赞扬阁罗凤是毫不奇怪的^[72]。树碑的主要目的是申明和唐朝关系破裂的责任不在南诏，强调南诏是不得已而对唐采取敌对行动的。也许南诏的领袖对双方的关系破裂很后悔；的确，从碑文内容看，这种破裂的情况不会永远存在下去。据说阁罗凤亲口说过：“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拔吾罪也！”^[73]可见，南诏与吐蕃的结盟只是权宜之计，如果情况一有变化，这种结盟关系对南诏不再有好处，那末，南诏与吐蕃的结盟就会中止，不会再保持下去了。

南诏和吐蕃结盟后唐朝的对策

南诏和吐蕃结盟后，唐朝大为震动。过去二十年间，相对地说，西南边疆一直是平静无事的。当时就是吐蕃，也因只顾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忙于对付阿拉伯人的扩张，巩固自己西部的边界，所以对唐朝没有构成很大的威胁^[74]。现在，南诏这个过去是相当友好合作的盟国，突然之间被激怒，成为劲敌，而且更糟的是把它推到吐蕃营垒一边，从此整个唐朝的漫长西部边疆地区就被强大而危险的结盟者的力量占据了。此外，唐朝在对云南发动的几次战役中蒙受了重大损失。由于爆发了安禄山之乱，为求生存，唐朝把可以使用的军队都调来打仗。在这种历史上有名的“外患”、“内忧”交困之下，唐朝急需调强大的部队到前线，但内部发生叛乱，过去相对稳定的边疆局势向充满了危险的方向逆转，所以使朝廷焦头烂额，束手无策。

南诏和吐蕃自然要充分利用这种局势。南诏在吐蕃的命令之下，于公元756年到757年之间攻占了嵩州。此后，在四川地区很少看到南诏的侵犯，只是在八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这个省区之内小规模叛乱还是不断发生就是了^[75]。

南诏还是有所克制的，它并未乘唐朝之危置唐于死地，但对吐蕃来说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在八世纪五十年代，吐蕃与日俱增地对唐朝的领土发动了激烈而大胆的进攻，以致不仅接管了唐朝的中亚的领土，甚至还占领了它的西北面的产马的重要地区河西和陇右，甚至在公元763年还一度攻占了唐朝的首都。有个研究南诏史的有趣而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占领西北乃至攻进长安的战争中，南诏的军队是否被吐蕃所雇用。这个问题因缺乏各方面的可靠资料而难以证实，但吐蕃在战争中惯于利用其盟国的部队和它所征

服的各族人民，因此，利用南诏军队冲锋陷阵也不是不可能的〔76〕。后来在西北和回纥作战时，确实有迹象表明吐蕃是利用了南诏的部队的〔77〕。此外，就没有更多的证据来谈论这方面的问题了。

公元756年至779年之间的有关南诏王国的汉文史料确实很少。这个时期重要的旁证文献是《德化碑》，但它所包括的年代也只到公元766年。因此，这一段时期中，关于南诏王国与唐朝和吐蕃的关系及其内部的巩固发展情况，我们的知识还很有限，许多历史问题还没有认识清楚。

可以查证清楚，有关公元776年的那种费解的说的史料的史料是很少的。有的汉文史料说，那一年，南诏也参加唐军，打退了吐蕃对四川的进攻〔78〕。还有一份可信的资料特别说明，南诏军的统帅阁罗凤在此次吐蕃发动进攻时支持了唐朝〔79〕。八世纪后半期此三强之间的总体的关系要说得符合实际是困难的，因为大量证据说明，南诏即使不是一心一意，也是坚决站在吐蕃一边的，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八世纪九十年代。王忠对《新唐书》中有关吐蕃、南诏的历史记载作过大量的注释，他总括地认为书中对三者关系作了不合常理的记述，它所采用的这些史料肯定是错误的〔80〕。

然而，佐藤长提出了一种更牵强附会的解释。他以该时期的西藏编年史作为汉文史料的补充，指出墀松德赞（乞立赞，754—797）在位时，据说“白蛮”曾经叛变，但随即被扑灭，又恢复了原先顺服忠诚的态度〔81〕。可惜的是这一事件发生的确切年代在编年史中却没有特别的说明〔82〕。但是，“白蛮”肯定与南诏有关，或至少与这个王国中的某些民族有关。佐藤长认为：汉文史料和西藏编年史中记载的事件可能互有关系；它们都说明，一部分南诏人在八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和他们的吐蕃大盟主之间曾经有过一段暂时的分裂〔83〕。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从西藏编年史和后来在文献上有明确记载的事件中更可以确知南诏和吐蕃的破裂为时不长。

整个八世纪七十年代，唐朝的四川军队在反击吐蕃周期性的进攻中看来一直颇为得手〔84〕。战争之所以节节胜利，和一个名叫崔宁（原名崔旰）的大员有关。虽说崔宁为儒家子，但他喜爱武艺。年轻时，他到四川从军，为步卒，在鲜于仲通部下服役。他参加了时运不济的李宓征讨云南的战役，在大溃败中保全了性命回到成都〔85〕（这表明，在八世纪五十年代远征云南的战役中，或许有较多的汉人生还，而不象其他虚构的材料所说的全年覆没）〔86〕。在四川，崔宁日益身居高位，声名显赫，最后奉命到成都西北的西山地区指挥军队，和吐蕃及与其结盟的羌人作战。战争中，崔宁取得了传奇式的功勋，使敌人从此闻风丧胆。而且重要的是，他在四川深得地方军队的拥护。

新任命的节度使郭英义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和崔宁很快就发生了争吵（郭不仅把崔的家属当成人质，而且还污辱了崔的女眷），但崔宁也很快地找到了谋反的口实，并在随后的斗争中争取到几乎全部地方军队的支持，把郭英义杀死。朝廷新任命的地方官杜鸿渐也怀有戒心，怕和郭英义一样同遭恶运。抵达成都时，不仅不复问罪，反而上表朝廷请求解除他的职务而派崔宁担任〔87〕。当时朝廷担忧的还是吐蕃对川边的侵扰和国内的动乱，决定授崔宁西川节度使，以取得他的支持〔88〕。

此后，崔宁好象就是利用他和吐蕃作战中的功勋作为晋升之阶保住了自己统治四川的权位。的确，只要吐蕃对四川的严重威胁一日不解除，只要崔宁能够掌握那里的局势，唐廷就不会考虑调换他的。据说为了邀宠于朝廷，依权臣为靠山，崔宁还派他的兄

弟带着大量金银财宝到长安，贿赂元载父子。因此，崔宁在四川的权位得以保住达十多年之久。崔宁在任时挥霍无度，荒淫无耻，朝廷对他也无可奈何^[90]。近代学者认为，崔宁实际上可能在奏章中有意夸大吐蕃的威胁，而且也有意谎报他在对吐蕃作战中的所谓不断打胜仗的功绩^[90]。

然而，崔宁在四川高官厚禄的地位实际上是篡夺起家的，这一点朝廷并没有忘记。最后，在公元779年，朝廷就随便找了一个藉口，把崔宁召回首都^[91]。显然，只要崔宁一旦回朝，就意味着再也不能返回成都了。

公元779年的入侵

公元779年，吐蕃决定联合盟邦南诏，对四川发动大规模的入侵。据说当时调动的军队总数多达十万人，这支敌军分三路进攻成都，其中南诏部队发源自西南他们控制的嶲州。这次大规模战争由谁先发动，是吐蕃或是南诏，有些史料对这个问题的叙述是非常模糊的^[92]。虽然，在《旧唐书·崔宁传》这份所谓最翔实的史料中，下面这段宣言肯定是吐蕃王发表的：“吾要蜀川为东府，凡伎巧之工皆送逻娑（拉萨），平岁赋一缣而已。”^[93]

显然，入侵者进展迅速。他们蹂躏了大片领土，使四川的老百姓不得不在混乱中上山逃命。这时，崔宁指挥过的和吐蕃作战的部队还有战斗力，但他已调职，接替者又无能，所以就不能组织有效的抵御^[94]。也许正是借崔宁离开之机，吐蕃和南诏才乘势入侵，因此，人们对崔宁在四川起过重大作用的问题也有过热烈的争论。

唐朝为入侵的警耗震惊，想调崔宁重返成都，应付严重局势。但是，朝中崔宁的主要对手宰相杨炎竭力反对。他坚持说由于崔宁在四川篡权，朝廷失掉了对此富饶省分的控制。他贬低崔宁的能力，说他的本领不强，只因当地叛乱才得到权位；如将他调回，在入侵者面前也必然无法对付。况且即使也真能退敌，朝廷亦不能直接掌握四川。“蜀地富饶，宁据有之，……是蜀地败固失之，胜亦不得也”^[95]。皇帝因而又被说服，仍然以闲散的职务将崔宁留于朝廷。

朝廷不用崔宁，而用著名将领李晟，命令他带领大约九千名由朝廷指挥的部队与地方防军组成的军队，从北方援救四川。虽然史料不足，但我们知道这次战争对唐朝完全有利。吐蕃、南诏联军被击溃，遭惨重损失后被赶出四川^[96]。

这真是唐朝的一个大胜仗。直接的影响是土地不再丧失，使以后几年内四川边界的局势趋于稳定，而且看来吐蕃的力量也因而大减，以致再也无力侵扰。此外还有种种原因，所以在公元779年以后，汉藏的关系显然大有改善。边界时紧时松的小冲突减少了，而且也安排了交换俘虏。经过认真讨论，双方终于在公元783年定界结盟于清水^[97]。沿四川边界一线，西山山脉和大渡河，都被确定为双方的天然边界线。双方同意，在这一线的迤东地区为汉界，迤西和西南，尤指包括磨些等部居住的地区为蕃界^[98]。双方关系大为改善，以致吐蕃甚至愿意帮助唐朝扑灭十分严重的，一度使唐朝又陷入政治危机的朱泚的叛乱^[99]。当然吐蕃的支持也并不是不要代价的，它要求唐朝割让给它西北的多余的领土。当朱泚之乱被镇压后，唐朝就不尊重吐蕃一方的利益了，因而又大大地损害了双方的关系，而使新订的条约成为废纸^[100]。

这一段历史的更重大的意义是，公元779年的胜利，对南诏和吐蕃的关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史书说吐蕃对这次的失败极为愤怒，它作出的反应是处决了战败的将领。很可能，受到严厉惩处的还包括南诏军队的指挥官，无论如何，这场打不赢的入侵战争的失败，吐蕃对南诏也采取了残暴手段，使得南诏的新王，阁罗凤的孙子异牟寻大为震惊^[101]。所以他就把南诏首都迁到新修的设防城市，今大理地方的羊苴咩城^[102]。接着，他的震惊变成了愤怒，因为吐蕃对盟国更加诛求无厌，沉重的赋税，年复一年的大量征兵，不断强加在南诏的头上；而且，南诏国的战略要地，也被吐蕃边防军接管^[103]。

这个时候，吐蕃还改封南诏为“日东王”^[104]。王忠说，这是南诏地位被吐蕃贬低的体现。因为以前南诏王被封为“东帝”，受到兄弟之国的待遇。现在，他的孙子则只有诸侯之位了^[105]。根据现存史料，王忠此说似乎比较勉强。然而，从此，南诏和吐蕃的关系日益产生怨恨和不信任成分却是真实的。

产生这种趋势的主要因素，似乎就是由于有了一位南诏的新王异牟寻这个历史人物和由此产生的背景。然而，在异牟寻的一生事业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显然又是由于他和他的师长、被俘的唐朝官吏郑回之间的关系。

郑回和异牟寻

郑回，相州（在今河南境内）人，公元756年至757年南诏占领嵩州时任西泸县令，在战争中被俘。然而，他本人的遭遇却证明他很会适应新的环境。我们知道，俘虏他的南诏人没有把他看成一个小兵，他们非常“爱重”他的学识和政治才能。阁罗凤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赐号“蛮利”^[106]。不久任命他为王师，在宫中教异牟寻在内的王族子弟读书，因而得到了南诏王几代人的尊敬和信任。看来，南诏吐蕃表面上虽然还保持反唐的结盟关系，但郑回在南诏日益倾向于对唐亲善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发挥了个人的影响和作用^[107]。

由于这些原因，公元779年，即使没有异牟寻对吐蕃的苛扰十分愤怨的情况，他对中国文化这时也非常的倾慕了。作为国主，据说异牟寻对国家的文化道德水平的低下十分不安，对南诏和中国的直接联系的中断十分惋惜^[108]。虽然，后来据中国史料分析，对这种说法似乎也有怀疑，但异牟寻一生受郑回的教诲这一情况，很可能是符合事实的。史书说郑回是一位严师，异牟寻等皇族子弟有过错，他也箠责，毫不宽贷，所以异牟寻以下都战战兢兢地侍立受教^[109]。

郑回是公元756年被俘后成为王师的，但阁罗凤时代他在政治上还没有什么积极表现。然而，公元779年异牟寻即位后，郑回就高升为南诏宫廷中的一位显贵人物。

“及异牟寻为王，以回为清平官。清平官者，蛮相也，凡有六人，而国事专决于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谨，有过，则回挞之”^[110]。

郑回在南诏宫中有这种威望的记载不知有何根据，所以不可当成真事。然而，在南诏国事的决策中他举足轻重，竭力影响国君却是事实。在按照唐朝的政治模式继续完善南诏的典章制度并不断促进南诏国接受汉族文学和文化的形式方面，郑回都无疑地是个关键的人物。他是公元766年珍贵文物《德化碑》的作者^[111]，而且无疑地是一位和唐朝交往时各种文书的主要起草和翻译者。他竭力拥护和唐朝恢复邦交的政策，但看来他

也确实在为南诏的利益工作。在史书中，确实没有发现他要设法回归汉地的记载^[112]。

史书虽无明文记载郑回的后人在南诏宫廷中所能起过的作用，然而，我们知道，他的五世孙郑买嗣后来篡位，在十世纪初建立了第一个继南诏而出现的王国^[113]。总之，从更直接的重大影响方面看，郑回是南诏内部起主导作用的力量，他竭力主张和吐蕃绝交，和唐朝的中国站在同一战线。

李泌和他杰出的战略

我们知道，八世纪末的二十五年间，中国西南边疆面临的局势极为严重。数十年不断的边衅战争，虽然还看不出结局，但已使国家衰弱不堪，时时有面临崩溃的危险。吐蕃和南诏的联盟虽然变化无常，但潜伏着风云突变的危险，使唐朝非常忧虑不安。犹有甚者，唐朝的再度不稳定局势又在八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几次内乱中显现了出来^[114]。因此，这个时期唐王朝最感严重的边患就是西南吐蕃与南诏的联盟。减轻这种严重威胁就成了唐朝外交政策中的最重要的课题。

为了挽救危局，李泌提出了一个相当可观的结盟计划。李泌自公元787年到去世时的789年任唐朝宰相，他主张的基本政策之一就是“以夷制夷”。他建议唐王发展和回纥的友好关系，当时回纥是从八世纪中叶到九世纪中叶统治蒙古大部份地区的突厥部落联盟，联合他们可以从北面增加对吐蕃的压力。此外，他还特别强调恢复和南诏的友好关系的重要性，这样就能不断削弱吐蕃的力量，最后在吐蕃的南部边界上给他们制造更多的麻烦。他甚至主张游说那些当时中国统称“天竺”的印度王国和大食帝国加入反吐蕃的大联盟。他一再对德宗皇帝禀奏他的主张，坚持说这样做大有害于吐蕃而不费唐朝的一兵一卒。李泌把他这种主张的理由，简单地归纳成为这样的话：

“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南诏），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115]。”李泌认为南诏具有倾向唐朝的特性，他提出这样的估计：

“云南（南诏）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

至于天竺和大食，他也说：

“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116]。

虽然李泌在这方面的献策实现的很少，但把大食和天竺诸王国都包括于反吐蕃的联盟中的这个理想也并非不可能。天竺人和唐朝有过外交接触，公元720年，他们把战象和骑兵提供唐朝，用于共同对付吐蕃和大食的联合战争。这类的外交接触至少延续到整个八世纪五十年代^[117]。八世纪初至八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食两国间的外交接触也很频繁；在唐朝从安禄山叛军手中收复长安洛阳的战役中，也使用过大食的军队^[118]。八世纪八十年代，大食人已成吐蕃的大敌。中国人很清楚，大部份吐蕃部队已调去抵御从西方来的大食人，所以吐蕃在边界攻击唐朝的次数已逐渐减少^[119]。

李泌主张结盟的主要对象是回纥与南诏。但当他一提到与回纥结盟，就立即遭到德宗皇帝本人的强力反对。原来在二十五年前，这位皇储在出使回纥时曾大受屈辱。当时回纥人骄傲自大，他们要这位唐太子当众对回纥可汗表现出尊敬的样子，而且还要竭力

当众表示唐朝遭际困难，已经衰落。由于拒绝回纥的要求，随从这位唐太子的高级侍臣们受到可怕的打击，其中两人被杀身死。这位未来的皇帝本人虽没有受害，但这一次的屈辱使他终身都怨恨回纥〔120〕。

李泌对付吐蕃的策略一经提出就遭到了种种的阻碍。德宗对李泌献策中的所有的其他部份是考虑采纳的；但关于回纥的部分则决不加以考虑。李泌为了说服皇帝和回纥谈判，就巧妙地进行辩解，从心理上敏锐地揣摩，和皇帝反复计议〔121〕。德宗终于不得不以国事为重，把个人的怨恨放在一边，勉强地对李泌的建议表示赞同。

使皇帝感到意外也感到高兴的是，回纥人在这个时期很愿意使他们的统治者可汗和唐公主成亲，以证明他们很希望双方的谈判能够达成协议，因此，他们在外交上已不再坚持一律平等相待的原则。结果，顺利地作出了联姻的安排，咸安公主（在整个唐代，和外国君王成亲的皇帝亲生公主只有三个，她是其中之一）出嫁到回纥可汗王国〔122〕，从而为实现李泌反吐蕃的战略奠定了基础。

韦皋和西南边疆

李泌，献策中的另一主要部份，争取南诏合作反吐蕃，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实现的。在这部份献策取得成效之前，李泌就去世了。代替他实现这部份政策的主要人物，是长期任四川节度使的韦皋。公元785年前后，由于平息朱泚和朱滔的叛乱有功〔123〕，他被委派到成都赴任直到公元805年逝世。韦皋不仅娴于韬略，在一系列反吐蕃战役中打了胜仗，而且还能够巧于利用吐蕃和它的同盟者南诏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虽然他似乎只不过是按照有利于唐朝一贯的筹边总方略行事，但实际上他个人所起的作用亦不可低估，因为正是有了他，边防政策才能得到切实执行，南诏和吐蕃之间的破裂才日益扩大〔124〕。

自公元778年以来，从形式上看，唐与南诏的关系变化不大。然而，779年南诏和吐蕃的军队在联合进犯四川时大败，接着吐蕃对南诏施展了残酷的惩罚手段，征收很重的赋税和力役，因而在两国间更播下了不信任和怨恨的种子。异牟寻的清平官郑回乘机进言，敦促南诏和吐蕃断交，再回到唐朝一边。他辩解说，以前南诏尝款附中国，和吐蕃相比，中国讲究礼义，向南诏求取非常少〔125〕。异牟寻立即表示接受，但怕吐蕃报复，怕引起盟国的疑心。直到公元794年，异牟寻都不愿得罪吐蕃，所以一直掩饰着双方的矛盾。然而，异牟寻迫切地探求和唐朝复交的可能性，暗中或多或少地间接接触已为常事。在接触的过程中，这个地区被总称为东蛮的居间小部落，其中尤以勿邓、丰琶和两林部落起了重要作用〔126〕。

新节度使韦皋到川后所采取的解决边疆问题的明确的步骤，就是要加紧和南诏接触。因此，他特别注意和他管辖下的居于南诏和吐蕃之间的诸部合作，使他们起着缓冲的作用。他在787年春写的奏文中对吐蕃问题的看法，和他后来在奏章中反复阐述的分析问题的观点，都是一脉相承，先后参证的，所以很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今吐蕃弃好，暴乱盐、夏〔在西北〕，宜因云南及八国生羌有归化之心，招纳之，以离吐蕃之党，分其势。”〔127〕

那一年中，韦皋的努力算得到了报偿，“东蛮鬼主”骠傍、苴梦冲和苴乌星都来到省会

成都^[128]。这显然是一个新的机会，所以据说南诏王异牟寻也派员混在东蛮使团中间，试探唐朝是否真心恢复友好关系^[129]。韦皋很快就看出了这种企求的含义而立即向朝廷禀奏。朝廷要他送信给南诏王表达对他们的赞赏^[130]。先是，韦皋曾训示另一个“东蛮鬼主”苴那时，要他派密探潜入云南，侦察南诏的政局^[131]。然后在当年末，利用南诏高层贵族中有精通汉文人士的条件，韦皋亲自写了一封致南诏朝廷的信，敦促他们赶快遣使到唐朝入见^[132]。

史料载异牟寻虽想内附，但还不敢自派使团到唐朝。而是在公元788年先派他所依靠的几个东蛮鬼主秘密地代表他到长安。在那里他们受到盛宴厚赠的款待，且都册封为王，得到赏赐的官印^[133]。

通过东蛮的告密者，确知南诏要和唐修好，但还在犹豫^[134]，韦皋就采取外交手腕，加紧离间南诏吐蕃。这时，吐蕃又准备发兵攻打四川，要它的盟国支援军队。南诏只好被迫响应，派出了一支大军。韦皋这时已写好一封信致南诏王，甚至赞异牟寻“叛吐蕃归化〔唐朝〕之诚”，然后使东蛮一“鬼主”将信给吐蕃，而不是给南诏^[135]。这一手十分奏效。吐蕃开始怀疑南诏，接着就遣兵二万屯会川，以阻塞南诏直接进入四川的道路。这一行动激怒了南诏，立即调回援助吐蕃进攻四川的部队。由此南诏与吐蕃大相猜阻，矛盾进一步扩大，因而和唐恢复关系的决心更大了^[136]。从这个时期起，南诏支持吐蕃攻击唐朝边界的军事活动越来越少了，这就更使韦皋有信心推行他的政策了。

这个时期，除外交上以这样方式疏通之外，韦皋在军事上也迭获胜利。公元789年在北靠嵩州的台登战役中，他获得了击败吐蕃的第一次胜利。吐蕃的重大败绩是大将迄藏遮遮（悉）在这一战役中战死——据说他是吐蕃大相尚结赞的儿子^[137]。此后十多年的时间内，韦皋统率的部队和吐蕃的军队作战都常胜不败^[138]。而这些胜利获得的原因，部份由于韦皋新团结招徕的东蛮诸盟在军事上的有力支援，这一点确实值得十分重视^[139]。韦皋对吐蕃的任何报复打击东蛮诸盟的威胁都迅速作出反应，坚决地保护他们的原因就在于此^[140]。

居间诸部对韦皋的经略边疆的总的规划筹谋是如此的重要，因此，从另一方面说，其中任何一个倒向吐蕃一边都会对他大为不利。所以他必须为之解除吐蕃的压力，使他们和吐蕃完全隔绝。当勿邓大鬼主苴梦冲突然在公元791年潜通吐蕃时，韦皋就果断地加以惩处，否则其他酋长就会效法而难于收拾。韦皋派人执法处决了苴梦冲，另委任一个可靠的酋长代替他的位置^[141]。韦皋的坚定政策必然使其他诸部酋长丧胆而不敢再生异心，背叛唐朝。

这一事件足以说明韦皋的边疆政策的一般特色。根据对边疆诸部和其利益的了解而制订的对外政策，一旦和唐朝所显示的坚定果决，卓有成效的军事威力结合，执行起来才能经常地获得成功。对付吐蕃，归根到底只有以武力才能遏止它的攻击。同样重要的是，虽然汉文化是很有吸引力的，但南诏和其他西南边疆民族的转而支持唐朝，也只有和吐蕃作战中证明唐军能打胜仗才能获得。最关键的是，韦皋指挥的军队能够而且会保卫他们自己和边疆的盟国不受吐蕃侵犯。在这方面，他功勋卓著，令人佩服。

此外，在外交方面，韦皋也显示了足智多谋。例如，公元787年春，他致书异牟寻，警告这位南诏国王当机立断，否则会失去和唐朝达成友好协议的机会，而又遭致吐蕃的报复。他这样辩称：

“回鹘屡请佐天子共灭吐蕃，王不早定计，一旦为回鹘所先，则王累代功名虚弃矣。且云南久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时依大国之势以复怨雪耻，后悔无及矣。”〔142〕

这一委婉的呼吁按理会打动异牟寻而有所反应的，但在公元789年，他仍不愿冒和吐蕃破裂的风险。

公元791年，发生了另外一个事件，使南诏和吐蕃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个时候，尽管从未得到直接的回答，韦皋还是不断地致书异牟寻〔143〕。在确信南诏对吐蕃入侵的支持越来越少，异牟寻更倾向于唐朝之后，韦皋就在这一年派遣南诏的故臣段宗义（他可能在战争中被汉人所俘）带信回南诏首都，再催促重新结盟。然而，段宗义途中必经磨些族控制地区。磨些族的首领“魁主”在种族文化上都比其他诸部更接近于吐蕃〔144〕，所以把段宗义的使命潜告吐蕃〔145〕。当段宗义抵达之时，吐蕃驻南诏首都的使节就知道他的使命，要求异牟寻说明事实真相。这使异牟寻大为惊骇，只好竭力掩饰说，段宗义只是南诏以前的一名官员，经韦皋允许回乡，但吐蕃不信，他们将他押回吐蕃。此后，他们更进一步把很多南诏大臣的儿子作为人质。吐蕃的种种行为，当然使南诏愈怨，双方的关系更加恶化〔146〕。

公元792年，双方的关系实际上已恶化到吐蕃南诏行将兵戎相见的地步〔147〕。当年，韦皋复致书异牟寻，建议联合作战，将吐蕃逐出云南高原。他说，对付吐蕃的边防线是能够加强的，唐和南诏的军队联合起来，就可以确保这条边防线〔148〕。韦皋还亲自指挥了一次向成都西北的西山地区吐蕃阵地进攻的战役〔149〕。他在这一年和翌年在此地区的获胜，看来应当是那些所谓的“西山八国”诸部随后降服的一个因素。“西山八国”就是于787年写的奏章中所说的“不肯降服的诸羌”。韦皋重新安置诸羌，供给他们驮载的牲口和需要的物资，唐朝控制的沿四川边疆一线地区的局势因而更形稳定〔150〕。在这些年里，随着一个一个的胜利，朝廷给韦皋加官晋爵，他的声威因而一天比一天增高〔151〕。

西南的新阵线

事态的发展终于使异牟寻改弦易辙，与吐蕃公开决裂而和唐朝重新结盟。公元793年初夏，他派遣了第三批专使到唐廷。当时使臣们采取了不同的路线，认为这样比较保险，因为即使在边界受到吐蕃的阻挠，其中必有一批能通过阻碍到达目的地。有史书记载说这三批使者都是一同到达成都晋见韦皋的。但从其他史料看，则情况并非如此。他们是一出四川（顺着穿过戎州的东路而行，而不是从路线比较直但可能已被吐蕃封锁的地区通行），一出唐地黔州（今贵州湖南地区），一出唐的保护国安南，最后皆到成都后被护送抵达长安〔152〕。当时，每一批使者都带着南诏认为合适的贡物，以表示对唐的忠诚：进贡金子以示坚贞，进贡丹砂以示赤诚之心，他们都显然接受了指令，一再表明南诏在八世纪五十年代与唐破裂是不得已的，请求唐朝给以宽恕。他们与吐蕃正式绝交，请求唐朝同意和南诏重新建立密切的关系〔153〕。南诏使者后来被护送到唐京时，韦皋也上表祝贺，这无疑是要向朝廷显示一番，使大家知道在这种重大的外事成就中，他本人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物〔154〕。